

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的

人 · 事 · 物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

# 目錄

序言	1
釋義	2
十九世紀香港的修院	3
* 人	4
傳教總部內的修院·漫長的培育期·國籍神父的卓越表現·著名的傳教過客· 來自聖召搖籃——鹽田梓	
* 事	9
教廷強調培養本地神職人員·從中上環到半山堅道·主教座堂旁的修院	
* 物	12
傳教區修院建築·修院規章	
二十世紀的華南總修院	14
* 人	15
耶穌會士的管理·會士以外的老師·對修生聖召的主觀判斷· 各國恩人慷慨支持·修生的學術成績·最終的教區歸屬·結出果實的聖召	
* 事	27
選址香港的緣起·總修院涉及的教區組成·財務來源和分攤· 政治事件的重大影響·華南總修院去向的討論·耶穌會對專上學院的質疑· 停辦成了事實·香港教區獨力承辦修院	
* 物	38
中式建築·課程簡介·圖書館·修院規章·天文及氣象儀器·考古收藏	
二十世紀的聖神修院	45
* 人	46
華南總修院培育出來的院長·修生有別於以往·培育團的轉變	
* 事	50
與耶穌會關係未了·在不同地點的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的出現及升格· 神哲學普及至平信徒	
* 物	57
神哲學院大樓·課程資料·圖書館藏書·與修院相關的出版著作	
圖片集	62

## 序言

《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的人事物》是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口述歷史研究計劃的一個分項。華南總修院成立於 1931 年，至 1964 年由香港教區接辦，更名聖神修院。在原稱鴨巴甸的半島上矗立的這所天主教大修院，2021 年迎來了它的九十周年。研究計劃的口述歷史部分，對尤其早年的重要人事物，未必能借在世者的訪問中留存，只好以這本小冊子作補充。

這裡要特別感謝林瑞琪博士及周景勳神父。林瑞琪博士作為本研究計劃的學術顧問之一，慷慨提供他一份未出版的文稿，內容主要包含一些他往昔與華南總修院畢業生的口述歷史訪問資料。這些受訪神父大多已回歸天父家，使得有關史料如今能為世人所知，更顯珍貴。現為神哲學院哲學部主任的周景勳神父在聖神修院的大小修院成長，又在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學成回港後一直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任教。周神父對學院的發展過程和意見，撰寫成的《反思梵二後香港教友神學培育的發展》，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參考內容。

本書的定位是通識讀物，讀者群不僅僅是教內的信徒或慕道者，更希望吸引到對天主教會或天主教歷史愛好者，以至教外人士，借從本書了解到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的點滴舊事。本書同時列明參考資料及口述歷史的訪問日期，以方便後來者的研究。

## 釋義

對於天主教或個別宗教的認識，一般困難在於其專有名詞。在談及位於香港的天主教修院之前，我們簡單解釋一些關鍵詞。正如序言中提及，本小冊子是通識讀物，故在此不會深入觸及部分名詞的神學內涵。

**修院**：又稱作修道院，這裡指的是培育男性天主教徒成為神父的地方。修院主要分大修院和小修院，大修院（major seminary）提供哲學和神學課程，一般是兩年至三年哲學，然後四年神學，是有意成為神父者的必經過程。大修院的學術程度可視為專上學院，接受培育者稱大修生。小修院（minor seminary），是為進入大修院接受正式神父培育前作準備的地方。小修院接納的學員稱為小修生，多為中學生，他們除了有靈修生活的訓練，還在修院內接受中學課程，並參與公開考試，如會考和大學入學試。

**總修院**：是一所大修院，但因它是服務所處區域靠近的多個教會轄區，如監牧區、代牧區或教區，故是一所區域大修院（regional seminary）。

**神父、司鐸**：兩詞在本研究中互通。司鐸是指司祭，即主持祭祀者，來自拉丁語 *Sacerdote* 的音譯「撒責爾鐸德」，簡稱「鐸德」，後來教會援引儒家思想中稱主持教化者為「司鐸」一詞，正好配合天主教神父的職務將真道教化萬民，就將原本的「撒責爾鐸德」或「鐸德」改稱為「司鐸」。<sup>1</sup> 「神父」是信眾對司鐸的尊稱，代表司鐸肩負靈性父親的指導角色，此稱謂對神父本身也是其身分的提醒。

**晉鐸**：俗稱「升神父」，意指修生正式成為神父的祝聖禮儀。

**本堂神父**：必須是領過司鐸聖秩的人，是堂區的當然牧者，受主教委托管理堂區事務的神父，又稱主任司鐸或堂區主任。這幾個名稱在本研究中亦互通使用。

**堂區**：堂區是地區教會中固定成立的信徒團體，按常規是地區性的，由堂區主任在教區主教的權下，負責其牧靈事務，堂區主任是堂區本有牧者。

---

<sup>1</sup> 〈司鐸年話司鐸〉，見天主教教區中心及教理委員會網頁，  
<<https://dcc.catholic.org.hk/dcc/%e5%8f%b8%e9%90%b8%e5%b9%b4%e8%a9%b1%e5%8f%b8%e9%90%b8/>>，[2021-6-22]。

## 十九世紀香港的修院

華南總修院作為天主教會培育神父的機構，它的成立肯定是二十世紀香港天主教會的重要事件之一。然而，它並非香港的第一座修院。實際上香港早於十九世紀成為傳教區時，便已有修院，只是條件簡陋。第一任宗座監牧若瑟神父（Fr. Theodore Joset）1842 年被逐離澳門時，帶同逾二十位來自大陸不同傳教區的神學生來港。<sup>2</sup> 但他們不是專門為香港服務，而是晉鐸後派回所屬傳教區工作。

這些修生最初的落腳點，說不上是修院，而是在威靈頓街兩間由茅草搭建的簡陋棚屋。為了在該址興建教堂，若瑟神父於是在原灣仔天主教墳場（萬茂里附近）的地盤上，即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現址，「剷平一座小山，以興建一所修院」<sup>3</sup>。據宗座監牧斐神父（Fr. Antonio Felicani, OFM）的報告，新修院由磚砌建而成，在教會規劃的「『慈善機構區域』，位於灣仔山區、面海，山腳是皇后大道……是全港最佳地點之一……足以給棄嬰院、醫院、修院、學校和小聖堂。」<sup>4</sup>

---

<sup>2</sup> 夏其龍著、蔡迪雲譯：《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 79。

<sup>3</sup> 田英傑著、游麗清譯：《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1983），頁 29-30。

<sup>4</sup>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92-93。

人



梁子馨



梁 (瑪爾谷)



石抱璞

首批本地畢業生：

馮德堯

劉榮耀

葉蔭雲





左：  
本地聖召搖籃——鹽田梓  
下：鹽田梓村民舊居一角



## 傳教總部內的修院

位於中上環威靈頓街的新聖堂「聖母無原罪堂」於1843年中落成後，三名修生於1846年便搬進了聖堂旁邊的傳教總部<sup>5</sup>二樓，成為正式的本地修院之始。初期修生流動性很大，而且國籍不盡相同，既有來自中國華東江南地帶，也有美國人，甚至有英國士兵。相比於在香港晉鐸但全軍覆沒的歐籍神職人員，當時的華人神父成功率很高。<sup>6</sup>

至於培育導師，主要是外籍傳教士，但他們都是沒有接受過正式的神學教學訓練。而華人神父梁敬之在修院教授英文及葡文時，已是二十世紀初之事。<sup>7</sup>

在人數方面，在1851年時華人教友只有九百三十人。<sup>8</sup>1870年，香港傳教區修院有神學生和哲學生各三人，小修生四人。1878年，據第一份天主教期刊 *Hong Kong Catholic Register* 報道，修生有十一人，全都是中國人。<sup>9</sup>其後，半山堅道的聖母無原罪修院於1888年建成時，有修生十二人。但時至1926年，修生人數達四十人。

修生們如當代的所有修院一樣，需要學習拉丁文，以攻讀哲學、神學；而傳教區修院的華人修生的拉丁語「說得不錯，有些還能以拉丁文寫文章……發音非常正確，比起一般中國人說英語著實是好得多」。<sup>10</sup>

## 漫長的培育期

根據不同資料，梁子馨神父在1850年2月成為修院第一位修生，也是一段時間裡的唯一修生<sup>11</sup>；梁馬爾谷神父亦於同年進入香港傳教區修院，但沒有月份的資料。

---

<sup>5</sup> Mission House 的中文名稱，有譯作傳教總部、傳教所及傳教堂。

<sup>6</sup>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頁212。

<sup>7</sup>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頁215；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旅途上的古人》（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跟進小組，2006），頁8。

<sup>8</sup>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頁104。

<sup>9</sup> *Hong Kong Catholic Register*, 1878年7月22日，第31期。

<sup>10</sup>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95。

<sup>11</sup> 〈梁子馨神父〉，《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3CQvAYJ>〉，[2021-6-22]。



不過，他們從進入修院至晉鐸為神父的時間，都不盡相同，如兩位有叔侄關係的梁瑪爾谷和梁子馨神父，前者比後者早一年於 1861 年晉鐸，即修道時間分別是十一及十二年。又如 1856 年從上海來港的朱斯德望，修道十年，於 1866 年晉鐸，而與他同年晉鐸的梁雅各伯神父，則是於 1852 年進修院，學習期長達十四年。<sup>12</sup>

由於缺乏詳細資料，未知為何他們修道時間長短的原因。然而，從本研究口述歷史部分可知，學習拉丁文為很多修生是件苦差事，更有「不會拉丁文就是沒有聖召」的說法。上文指出「有些修生還能以拉丁文寫文章」，意即有另一些未達此水準，或許可猜想各人語言天賦不同，使得有些修生需要有更長的學習期。此外，當修院長上對個別修生當神父的合適性有懷疑時，又未至於需要他們離開，也會作出一些特別安排，藉此加以觀察。

### 國籍神父的卓越表現

當時的傳教會由外籍傳教士主導，不免對華人神職及信徒產生歧視，視為次等。「宗座傳教士」頭銜本是授予當權的外籍傳教士，使他們可享有一些華人神職人員不能享有的權利。<sup>13</sup> 然而，在傳教區修院培育出來的國籍神父中，有幾位也得到教廷的殊榮。例如梁子馨神父，他曾陪協助和神父（Fr. Simeone Volonteri）繪製新安縣地圖，又陪同高主教（Bishop Giovanni Timoleone Raimondi）到大陸考察及處理香港傳教區的債務問題，得到高主教推薦，於 1912 年獲授予「宗座傳教士」榮譽。同獲此殊榮的，還有盧鏡如神父（1919）、林蔭棠神父（1926）及司徒廷昭神父（1926）。<sup>14</sup>

提到高主教，來自澳門熱心天主教家族的譚安當神父，是第一位由高主教祝聖的神父，可惜於 1875 年在傳教途中溺斃。譚神父的姊妹是耶穌寶血女修會創會成員譚瑪達肋納和譚若翰納修女，他的弟弟也在小修院就讀。

此外，香港出生、1906 年加入傳教區修院的石抱璞神父更於 1954 年成為香港首位華人副主教。此要職的重要性在於，當時傳教區的領導位置都是由外籍傳教士擔當，直至意大利籍主教白英奇（Bishop Lorenzo Bianchi）

<sup>12</sup>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94-95；夏其龍：《旅途上的古人》，頁 8-11。

<sup>13</sup>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頁 211。

<sup>14</sup> 夏其龍：《旅途上的古人》，頁 8-11。

為回應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65）本地化的號召，才開始逐漸由華人全面帶領本地教會。石神父亦是華人神職班中，首位獲教宗任命為「榮譽侍從」，領蒙席銜的神父。<sup>15</sup>

## 著名的傳教過客

聖言會的安治泰神父（Fr. Johann Anzer）1880年開始在山東傳教，被稱為「魯南之父」<sup>16</sup>，並獲任命為主教及宗座代牧。安治泰神父與福若瑟神父（Fr. Joseph Freinademetz，2003年宣聖）是首批派往中國傳教的聖言會士。在啟程往山東之前，他於1879年與福若瑟神父來港學習中文以應付到內地的傳教工作。安神父在港期間，亦在神學院任教。<sup>17</sup>

## 來自聖召搖籃——鹽田梓

而今為聖人的福若瑟神父在西貢傳教，包括鹽田梓（亦寫作鹽田仔）。這是香港一條天主教村落，也是本地教會的聖召搖籃，曾出了兩位神父及五位修女。鹽田梓歷史可追溯至十五世紀的客家陳氏家族，他們家族的第三支移居西貢鹽田梓。第一位成為教區神父的是陳丹書神父（1890-1975），他於1901年進修院，1917年晉鐸。另一位是在教區擔任副主教多年的陳志明神父，他於1966年進入聖神修院。至於五位修女，分屬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及本地的耶穌寶血女修會，例如前者有陳保祿修女（1912-2010），後者有陳瑪利（慕英）修女（1901-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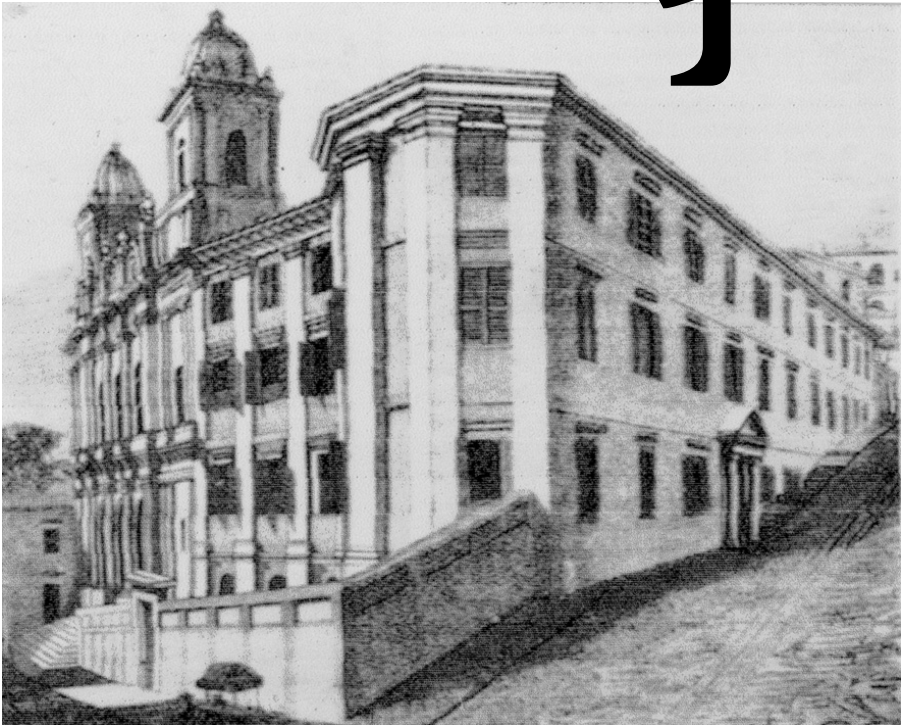
---

<sup>15</sup> 夏其龍：《旅途上的古人》，頁19。

<sup>16</sup> 方濟各·若瑟·艾勒斯：〈聖言會艾勒斯神父談聖言會士楊生及福若瑟獲封聖人〉，《梵蒂岡電台》，2003年10月6日，〈<https://bit.ly/3xPKUAY>〉，[2021-6-21]。

<sup>17</sup>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頁209。

# 事



1843-1886 年威靈頓街聖母無原罪堂及傳教總部

## 教廷強調培養本地神職人員

教廷傳信部（1967 年更名為萬民福音傳播部）早於 1888 年向中國傳教區代牧發出的《從主教著手》（*Quae a praesulibus*）的指令中，已強調要培養本地神職人員。設立大小修院及課程內容，以脫利騰大公會議的標準為依歸，來達到目標。至於必須學習的拉丁文，一般需時六年學習基礎語法和文法，四年學習拉丁文學，加上哲學、神學、教義等科目，「大致上來說，1930 年以前中國神職人員的陶成期間需要十五至十七年」。<sup>18</sup>

## 從中上環到半山堅道

傳教總部在 1843 年建成三年間已不敷應用，其後又受鄰近桌球室大火波及，使原有建築物部分受損。大火發生於 1859 年，當時傳教堂的擴建工程快要竣工，「熊熊的火焰在不到兩小時的光景，把新祭衣房、傳教堂、文祖利神父編的八百多部拉丁中文字典……全部焚毀……聖堂頂及祭衣房頂均已塌下，鐘樓的頂蓋亦已化為灰燼，大鐘掉在地上」。<sup>19</sup>

聖堂雖於 1860 年在原來位置修復重開，1878 年差點再次被鄰近火災波及。<sup>20</sup> 首任宗座代牧高主教遂決定賣出威靈頓街的教會土地，在半山堅道另建主教座堂。

## 主教座堂旁的修院

新的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於 1883 年奠基，1888 年竣工，後方用作「聖母無原罪修院」的平房亦同時建成，兼備大小修院的功能。不過，由於師資有限，修生多於小修院畢業後便送往澳門、檳城，甚至意大利羅馬和那不勒斯的大修院繼續攻讀。<sup>21</sup>

1900 年，修院又被遷到主教座堂前方的新建樓房，即高主教書院現址。該幢建築樓高三層，除了修院用地，地下為公教聯會，故修生除了日常學習之外，也協助傳教工作。聖母無原罪修院曾於 1925 及 1928 年進行修葺及

---

<sup>18</sup> 陳聰銘：〈法國保教權對中國天主教會本土化之影響〉，《中國大陸研究》2021 第 64 卷第 1 期，頁 32-33。

<sup>19</sup>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56-57。

<sup>20</sup>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頁 112-113。

<sup>21</sup> 馮勝利：〈香港教區聖召培育概略〉，載《二十世紀香港天主教會歷史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天主教研究中心，2021），頁 177-178。

擴建，即使華南總修院於 1931 年建成後仍在運作，直至在日軍佔領時期遭破壞，並因經濟困難而停辦。<sup>22</sup>

除了傳教區修院，香港也曾有其他修院存在過，如 1850 年由佐拉蒂蒙席（Monsignor Zolati）主管、為山西修生而設的修院；1851-1873 年廣東監牧區修院也設在香港。個別國際男修會，如耶穌會、慈幼會，也在本地設立修院。<sup>23</sup> 1873 年本篤會獲邀來港辦教育時，也打算興建修道院，卻遭當時的高神父拒絕，以保護自己所屬的宗座外方傳教會在港的傳教權利。<sup>24</sup>

---

<sup>22</sup>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96；及〈香港教區修院開始恢復 招收有志修道晉鐸品者〉，《公教報》，1949 年 1 月 16。

<sup>23</sup>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97。

<sup>24</sup>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頁 210。

# 物



堅道聖母無原罪修主教座堂及修院

## 傳教區修院建築

傳教區修院起初位處於傳教總部內，今威靈頓街近砵甸乍街上坡方向。裴神父至傳信部的信件中，描述三層高的傳教總部外形「既華麗又有氣派」，由於地勢高低不均，向海一邊較低，長度六十六尺，較高一邊長五十四尺，耗費七千葡幣。<sup>25</sup> 其一、二樓共有十一個睡房和一個飯堂，三樓有六個用作工人房的儲物房。<sup>26</sup>

## 修院規章

修院的第一份規章於1875年代牧區會議後出版，以拉丁文撰寫，內容包括修院宗旨、神修活動、紀律與習慣、讀書、服飾、工作及舉止、寢室監督、祭衣房管理員、遵守規則。規章裡更提及，因「很多中國居民是客家人，因此希望我們的修生能夠學習客家話、甚至其他方言……但不應荒廢古文」。<sup>27</sup> 雖然當時教會的官方語言是拉丁文，但在此可見教會深明本地化的需要，福音能傳播給平民百姓，得採用他們能夠明白的語言。

---

<sup>25</sup>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1。

<sup>26</sup>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頁 80-81。

<sup>27</sup>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92-93。

## 二十世紀的華南總修院

在談到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時，總不免會提到由剛恆毅總主教（Archbishop Celso Constantini，後擢升為樞機）於 1924 年在上海召開的第一屆中國主教會議（*Primum Concilium Sinense*），其中的重要決議包括在中國成立十四所地區性的「總修院」，也就是成立華南總修院的緣起。

此會議源於教宗本篤十五世於 1919 年發表的《夫至大》牧函（*Maximum Illud*），號召推動傳教區的本地化，實則是繞過法國保教權對中國教會發展的限制，以及扭轉傳教會不落力培訓本地人才的局面。<sup>28</sup> 該會議的重要性在於，它被視為教會中國化的基礎。雖然當時中國教會絕大部分由外籍傳教士管理和牧養，來自全國的出席者僅成和德和孫德楨是國籍宗座監牧，但亦可看到主辦者力圖讓該會議不但是「為中國人」而召開，亦是「由中國人」參與。<sup>29</sup>

及至 1936 年，十一所總修院先後成立，分別位於：吉林、柵欄（北平）、宣化（河北）、漢口（湖北）、濟南府（山東）、大同府（山西）、開封（河南）、成都（四川）、南昌（江西）、寧波（浙江）及香港仔（香港）。至 1949 年，共有十六間總修院及很多地方上主要的修院。<sup>30</sup>

---

<sup>28</sup> 夏其龍：〈影響中國傳教至深的夫至大牧函〉，載《鼎》，2019 年秋季號，第期總第 119 期：頁 32-40。

<sup>29</sup> 林瑞琪：〈剛恆毅與一九二四年上海會議的國籍教長〉，載《鼎》，2008 年春季號，第 28 卷總第 148 期：頁 23-38。

<sup>30</sup> 駱顯慈著、林瑞琪譯：〈華南總修院歷史考究〉，尹雅白編：《鐸跡天涯——華南 / 聖神修院金禧紀念特刊》，（香港：特刊編委會，1981），頁 13。





1950年代，華南總修院修生以拉丁文進行辯論比賽

華南總修院耶穌會教授與第一批修生





1963 年華南總修院的師生合照

宿舍內的簡單擺設



## 耶穌會士的管理

華南總修院是教廷傳信部委托愛爾蘭耶穌會主理，所以前後六任院長，均為愛爾蘭籍耶穌會士。這是天主教會在傳教區發展的一種特色。每當教會要創立一項事工或開拓一個新的傳教區域，就會將教務交托給一個修會或傳教會，由該會全權負責。這種做法有其優點亦有其缺點。

優點：草創階段容易支撐。修會及傳教會已有建成的體制，容易在其已有的基礎上調配人手，比起其他團體每每需要從零調集人才，可以更快捷有效。

缺點：人才局限於某一修會或傳教會，過分受到該會的影響，難以接觸到其他文化。此外，也失去吸收其他團體人才的機會。

華南總修院從 1931-1964 年的六任院長都有一個很優雅的中文名字，首任院長是古端敏神父 (Fr. Thomas Conney, SJ)<sup>31</sup>。對於歷任院長及修院其他長上的評價，畢業生都各有不同，大體正面，但也有負面的評斷。

在問及「(華南)總修院神父惡唔惡？」的時候，李毓明神父的第一時反應就是：「唔惡。」耶穌會士都是很友善的。<sup>32</sup> 陳子殷神父的心目中，倫若瑟神父 (Fr. Joseph Garland, SJ) 「有如活聖人，很重視祈禱，聖德好，要求高，以本身的榜樣去帶領學生」。<sup>33</sup>

值得一提的是，耶穌會在主持華南總修院的三十三年間，從未要求任何一個修生轉入耶穌會，亦不派遣修生到華南總修院攻讀。可以說純為華南總修院服務，是該修會對華南各教區無私的奉獻。修生在畢業晉鐸後，再申請轉入耶穌會的人士，亦不多見。據 1981 年的金禧特刊資料，只有陳禮耕神父一人。

---

<sup>31</sup> 古神父的名字又曾譯作「康寧神父」。然而，卓正賢神父 1941 年所著〈華南總修道院史略〉一文，使用古端敏神父。卓神父曾親身受教，資料理應可信。黎正甫教授的文章，及其他多處資料，皆作「古端敏」，可見這應是他當時的正式中文名字。

<sup>32</sup> 林瑞琪訪問李毓明神父，2003-2-28。

<sup>33</sup> 林瑞琪訪問陳子殷神父，2002-8-28。

## 華南總修院歷任院長

中文名字	英文名字	備註
古端敏神父	Fr. Thomas Cooney, SJ	1931—1934 院長 1935—1937 院長
馬 良神父	Fr. J. O'Meara, SJ	1934—1935 代理院長 1937—1947 院長
夏禮士神父	Fr. Richard Harris, SJ	1947—1951 院長
倫若瑟神父	Fr. Joseph Garland, SJ	1951—1957 院長
黃永耀神父	Fr. John Wood, SJ	1957—1963 院長
科利神父	Fr. John Foley, SJ	1963—1964 代理院長，其時黃永耀神父因眼疾休養

## 會士以外的老師

由於教學上的需要，總修院也邀請多位外間的學者前來講學。其中早期有一位段先生，曾在北平任教，1937年北平淪陷後，南下香港，在華南總修院教授中文。<sup>34</sup> 另一位是黎正甫教授。他在1940-41年曾短暫在華南總修院教書，但長期任教則是自1946年開始，至1968年為止。<sup>35</sup>

華南總修院亦有邀請中國籍的神父在開學前為修生主持避靜，多數從肇慶或澳門請來，都是耶穌會士！<sup>36</sup> 及至後期，總修院擴大教授的陣容，但新增的奧地利、加拿大及中國籍的神父，仍是耶穌會士！<sup>37</sup>

然而，要在華南總修院任教，壓力也不少。總修院於五十年代曾聘請外來老師教授哲學一年級的數理化課程。當時的哲學生當中，余尚實、蔡時等多位修生都是華仁書院的畢業生，老師所教的，早已學過，全無新意。於是聯手對付老師，終於半年後把這位可憐的老師趕走了。<sup>38</sup>

<sup>34</sup> 林瑞琪訪問黃勇牧神父，2003-1-3。

<sup>35</sup> 黎正甫：〈修院創辦的宗旨與聖召的培育〉，載於尹雅白編：《鐸跡天涯——華南 / 聖神修院金禧紀念特刊》，（香港：金禧紀念特刊編委會，1981），頁22。

<sup>36</sup> 林瑞琪訪問黃勇牧神父，2003-1-3。

<sup>37</sup> 林瑞琪訪問曾慶文神父，2004-7-9。

<sup>38</sup> 林瑞琪訪問姚崇傑神父，2004-7-20。

以下的教師名單，主要參照馮德堯神父著〈華南總修院的初期生活〉<sup>39</sup>一文，並參考1954, 1957, 1958, 1963各年的《香港天主教手冊》。名單基本上以出現先後排列，可能並不完整。除了兩位是平信徒，全是耶穌會神父，而會士當中，亦只有三位中國籍神父、其他全是外籍神父。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潘佐治神父	Fr. George Byrne, SJ
簡力達神父（又稱紀神父）	Fr. Gerald Kennedy, SJ
蔡伯德神父	Fr. Patrick Joy, SJ
嘉利華神父（又稱嘉文翰）	Fr. Richard W. Gallagher, SJ
明神父	Fr. Thomas Fleming, SJ
祁祖堯神父	Fr. Gerard Casey, SJ
何博禮神父	Fr. Henry O'Brien, SJ
武倫神父	Fr. John Moran, SJ
鄧乃理神父	Fr. Dan Donnelly, SJ
范達賢神父	Fr. Daniel Finn, SJ
高伯仁神父	Fr. Patrick Grogan, SJ
戴禮安神父	Fr. Charles Daly, SJ
簡理察神父	Fr. Richard Kennedy, SJ
莫神父	Fr. Marahan, SJ
段先生（中國籍）	Mr. Duan (Chinese)
黎正甫先生（中國籍）	Mr. Lai (Chinese)
林喜達神父（又名林善達） （加拿大籍）	Fr. Henry Forest, SJ, (Canadian)
謝神父（中國籍）	Fr. Francis Xavier Ts'a, SJ (Chinese)

<sup>39</sup> 馮德堯：〈華南總修院的初期生活〉，載於劉蘊遜、尹雅白編：《華南 / 聖神修院鑽禧紀念特刊》，（香港：鑽禧慶典籌委會，1991），頁20-21。

劉玉峰神父（中國籍）	Fr. Simon Liu, SJ (also Liou) (Chinese)
袁廷棟神父（中國籍）	Fr. Matthew Yuan, SJ (Chinese)
彭光雄神父	Fr. Alan Birmingham, SJ
龔世安神父	Fr. Ciaran F. Kane, SJ
郭年士神父	Fr. Edward Collins, SJ
駱顯慈神父（初名駱輝長）	Fr. Michael McLoughlin, SJ
薩震東神父	Fr. Leopold Bourassa, SJ
龔自珍神父（又名龔自真） （奧地利籍）	Fr. John Kronthaler, SJ (Austrian)
勞達一神父 （匈牙利籍）	Fr. Ladislaus Ladany, SJ (Hungarian)
狄守敬神父	Fr. Mark Hardy, SJ
紀列義神父	Fr. James Kelly, SJ
白禮達神父	Fr. Peter Brady, SJ
麥健泰神父	Fr. Thomas McIntyre, SJ
廖彌意神父	Fr. Thomas O'Neill, SJ
劉勝義神父	Fr. John Russell, SJ

### 對修生聖召的主觀判斷

即使是最好的院長，他的判斷有時對有時錯，被錯判為沒有司鐸聖召，不宜升神父的包括有已故的馬千里神父。<sup>40</sup>

馬神父回憶當時院長對待自己的遭遇，他在1952年修院畢業後，未立即獲准晉鐸，而是安排了不同的工作：

白天大部份時間我做護士的助手，或做學校的雜役。總之，是在女孩子堆裡；我心中非常納悶，原來這又是院長的傑作，在我未來之前，他寫信給瑪利諾會長及這裡的負責神父，告知收納我的

<sup>40</sup> 馬千里神父 1955年在帝汶晉鐸，1962年任香港教區《公教報》主編一年，在此前後曾在東南亞不同地區傳教。他於1970年赴台灣工作，其後更擔任台中教區主教代表。

條件有三：一、把我完全當俗人看待。因此不得著神職服，也不得用職稱呼「修士」，更不得住在教堂範圍內；二、不得洩漏我的底細；三、要跟女孩子在一起工作，因為我的聖召是結婚。<sup>41</sup>

## 各國恩人慷慨支持

傳信部的撥款不足，部分教區又沒有付款能力，財政壓力變相落在耶穌會身上。修院的耶穌會士每年都要籌募修院經費，亦十分困難。他們開拓資源的其中一個方法是為修生聯絡「恩人」（benefactor），每位修生都會有特定恩人，支持他們的生活費及學費，這些款項是直接支付給修院帳房，零用錢則交予修生。<sup>42</sup>

有時，傳信部亦為修生轉介恩人。但修院不會讓修生直接知道恩人是誰，直至修生升神父以後，才告之恩人的真正身分。例如姚崇傑神父的恩人由兩組人合成，包括荷蘭一個堂區及美國一位老太太。<sup>43</sup> 劉蘊遜神父則指出，並不是每個修生均有恩人，修院只會為貧困的修士，向各國的善長找恩人，後來安排修生可向恩人寫信答謝。<sup>44</sup>

湯漢樞機回憶說，他到後來才知道，當時的耶穌會士，在歐洲的報章中刊登了廣告，列出了所有修生的名字，呼籲人們支持。有一位在塞浦路斯服役的英軍成員見了廣告，遂選了他和另一位修生，寫信給華南總修院表示支持他們。這位英軍與其德籍太太後來在德國定居，湯樞機升神父之後去德國探望他們。登廣告之事就是由他們告之。<sup>45</sup>

恩人有時不但支持修生在修院的學業，甚至在修生晉鐸之後，仍發揮重要的支援作用。曾慶文神父剛剛當神父不久，考取了留學的機會，全靠奧地利的恩人提供獎學金，才可以順利出國留學。<sup>46</sup>

<sup>41</sup> 馬千里：〈難民營裡的傳道員〉，載於尹雅白編：《鐸跡天涯——華南 / 聖神修院金禧紀念特刊》，（香港：金禧紀念特刊編委會，1981），頁 57。

<sup>42</sup> 林瑞琪訪問李毓明神父，2003-2-28。

<sup>43</sup> 林瑞琪訪問姚崇傑神父，2004-7-20。

<sup>44</sup> 林瑞琪訪問劉蘊遜神父，2002-10-11。

<sup>45</sup> 林瑞琪訪問湯漢樞機，2003-3-11。

<sup>46</sup> 林瑞琪訪問曾慶文神父，2004-7-9。

## 修生的學術成績

華南總修院有些特別安排，在今天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但當時卻似乎不成問題。其中一項，是修生畢業，修院設有總考，但修生可以申請不參加考試。不過，這樣一來，將來就不能去外國進修了。<sup>47</sup>

即使總修院發了神哲學文憑，對畢業的神父仍存在一定的不便。由於政府不承認總修院的文憑，神父在香港進修便出現困難，所以申請在本地深造，只可以用高齡學生（Adult Student）的身分。即使在津貼學校教書，也不能成為註冊教師（Registered Teacher），只可以申請成為暫准教師（Permitted Teacher）。<sup>48</sup>

另一方面，即使不參加總考，但畢業的神父仍需要闖過另一關，就是到堂區工作之前，由教區秘書長主持進行授告解權的審查，是一場口試，不過可以用中文。<sup>49</sup>

除了告解權，年輕神父初出道，即使講道的內容也要先經過批准。<sup>50</sup> 晉鐸之後，在教會中仍有這麼多的審核，無怪乎修院本身對畢業生，可以持輕鬆的態度。

## 最終的教區歸屬

在華南總修院口述歷史部分，受訪的早期修生都有提到因內地政局變化，湧進了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修生，需要適應生活習慣。在語言方面，修院為遷就外來修生，本地修生需學習普通話，內地修生卻沒有學習粵語，原因是他們心想兩三年後即會重返大陸，沒有學習粵語的必要。已故的陳子殷神父提到，當時外省修生學粵語只有兩個原因：一是即將晉鐸，要學好粵語應付牧民工作；一是準備離開修院，學習粵語好能在外邊供職求生。<sup>51</sup>

五十年代的修生，由於中國大陸的政局，能返回內地的人為數甚少，所以多留在香港教區工作。但他們並不列入香港教區的神職班，而是屬於原有

---

<sup>47</sup> 林瑞琪訪問姚崇傑神父，2004-7-20。

<sup>48</sup> 林瑞琪訪問曾慶文神父，2004-7-9。

<sup>49</sup> 林瑞琪訪問李毓明神父，2003-2-28。

<sup>50</sup> 林瑞琪訪問劉蘊遜神父，2002-10-11。

<sup>51</sup> 林瑞琪訪問陳子殷神父，2002-8-28。



的教區，或代管該教區的傳教會和修會。以陶成章神父為例，他屬於廣西省桂林教區，而桂林教區在解放前是由美國瑪利諾會代管，於是在畢業晉鐸後依然是作為桂林教區成員，外借予香港教區，但生活費則由瑪利諾會負責。直至1970年，時任主教徐誠斌宣佈歡迎所有客居香港的華南總修院畢業生全部改屬香港教區神職班，才結束外借的局面。而各傳教會及各修會亦節省了不少生活費。<sup>52</sup>

按修院規定，修生在學期間是不可以轉換教區的。在一般情況下，教區神職人員或修會成員轉換教區，必須徵得雙方的長上同意，亦得本人同意，才可以轉換。但在華南總修院，修生若要轉換，則在上述各方同意之外，尚要徵得教廷傳信部的同意。<sup>53</sup> 可見教廷對修生轉換教區一事上的謹慎。然而，修生升神父的時候，卻可以選擇轉入另一個教區。

### 結出果實的聖召

華南總修院在其短短的三十三年間（1931-1964），共有二百三十位畢業生成功晉鐸。然而，在這人數不算太多的畢業隊伍中，竟先後出現了兩位樞機、兩位總主教、十五位教區主教或輔理主教。其數目之眾，內地其他總修院無出其右，表列如下：

華南總修院畢業生的晉牧名單（以就讀年份排序）<sup>54</sup>

姓名	原屬教區 (生卒年份)	就讀年份	晉鐸年份	晉牧日期 / (教區)
葉蔭芸	香港 1903-1990	1931-34	1934	1962.1.21 惠陽教區 1981年轉任廣州教區
林蔭坤 (林秉良)	廣州 1913-2001	1931-41	1941	1990.5.6 廣州教區

<sup>52</sup> 林瑞琪訪問陶成章神父，2002-9-6。

<sup>53</sup> 林瑞琪訪問陶成章神父，2002-9-6；林瑞琪訪問鄭再發主教，2002-12-4。

<sup>54</sup> 因當時的政教關係，名單中的部分大陸主教在晉牧時未有教廷批准。此外，中國天主教的官方體制沒有跟從天主教聖統制，部分往昔是教省或總教區的天主教轄區，不復存在，也沒有總主教的聖秩職級。而私下獲教廷追認的主教，才會有總主教職銜，如瀋陽教區金沛獻主教。

黃子玉	廈門 1911-1991	1932-34	1938	1986.11.30 廈門教區
鄭長城	福州 1913-2006	1933-35	1937	1991.2.24 福州教區
林聖恩 (林泉)	福州 1913-2007	1933-35	1937	1962.1.24 福州教區
鍾全璋	嘉應 (雅加達出生) 1921-2000	1945-48	1948	1989.5.7 嘉應教區
蔡體遠	汕頭 1920-1997	1945-48	1949	1981.9.27 汕頭教區
李宏基	香港 (廣州出生) 1922-1974	1945-52	1952	1971.9.8 香港教區輔理主教 1974.4.20 就任正權主教
胡振中	嘉應 1925-2002	1946-52	1952	1975.7.25 香港教區 1988.6.28 擢升為樞機
蔡秀峰	梧州 1917-2007	1946-48	1948	1993.12.3 梧州教區
陳 除	北海 1922-2003	1947-48	1949	1995.3.19 北海教區
鍾萬庭	老河口 1928-	1949-50	1954	1970.11.15 祝聖為馬來西亞亞庇 教區助理宗座代牧 1975.1.30 任命古晉宗座代牧 1976.5.31 轉任古晉總教區 總主教

金傳治 (金沛獻)	撫順 1924-2008	1949-51	1951	1989.5.21 瀋陽教區
鄭再發	廈門 1932-2007	1950-51	1957	1991.2.2 台南教區 2004.1.24 轉任台北總教區 總主教
汪中璋	建甌 (北京出生) 1934-	1952-59	1959	2003.1.30 三藩市總教區 輔理主教
林天助	嘉義 1935-1994	1955-58	1961	1986.1.12 嘉義教區
湯 漢	廣州 (香港出生) 1939-	1957-64	1966	1996.12.9 香港教區輔理主教 2008.1.30 任命助理主教 2009.4.15 就職正權主教 2012.2.18 擢升為樞機 2017.7.31 榮休 2019.1.3 奉委為宗座署理

此外，華南總修院的畢業生當中，尚有不少肩負了具有主教職務而未有主教身分的，包括監牧及教區長、教區署理等，已知者如下：

畢業生出任教區長或代理主教名單

姓名	教區	就讀年份	晉鐸年份	備註
涂敏正	台灣	1931-33	1936	台灣代理監牧
康應年	江門	1933-34	1940	曾被選為江門教區
藍國榮	嘉應	1934-35	1941	嘉應教區代理主教
謝瑞光	海南	1935-43	1943	海南教區教區長
黃中文	海南	1935-43	1943	海南教區教區長
陳時臬	汕頭	1937-38	1945	汕頭教區教區長
林焯焯	香港	1962-68	1967	署理主教

華南總修院亦為其後接手的聖神修院培養了多位院長人才，按先後次序應為馮汝鈞神父（1967-1968，1969-1971）、李宏基主教（1971-1973）、曾慶文神父（1974-1980），林焯焯神父（1984-1993），姚崇傑神父（1993-1999）及湯漢樞機（1999-2009）。

# 事



華南總修院外觀

《益世周刊》1949年報道，教廷對內地修生的安全作出指示

## 梵蒂岡教廷訓令

### 大修院移安全區

小修院亦盡人事之可能

特殊情形之教士可撤退

（本刊訊）據教會權威方面悉：關於教會人員由行將淪陷地區撤退問題，教廷已有明確指示，傳信部長畢翁德樞機，次長剛恒毅總主教，連教宗本人均一致主張：（一）大修院生遷往安全地帶，繼續學業；（二）關於小修院生，教宗謂全遷移遙遠地區，使能繼續進修，或無可能；（三）至佈道人員，除有少數特殊危險者可避海外，教宗謂其他聖職人員得留守其崗位。以上三項，聖部已有訓令致各地教區首長。次長剛總主教與其他聖部職員肯定，關於流亡修生之特別經費，聖部必予補助，唯先須向黎公使請求，因公使現有一筆特別補助金。

教廷各院部對我國民族與教會之遭遇，均極關懷，準備儘其量地予以援助云。（B）

## 選址香港的緣起

早在1922年，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已有意在香港成立一所總修院，以便收納華南地區有志修道的天主教青年。據剛總主教的回憶說：

本人在一九二二年被委任為中國宗座代表，抵華不久，即深察到香港有需要成立華南總修院，檳榔嶼修院雖具規模，可是，對中國來說，不但路途遙遠，且因就讀者國籍繁多，沒有機會予中國籍修生專習中文，而中國籍司鐸實在極需具備深厚之中文基礎。<sup>55</sup>

對於華南總修院的初創情況，除了得到主教和教長的附和，剛恆毅總主教致函傳信部時，亦顯示了其他有利因素：

我亦曾就此事與港督商討；就他本人來說，他願意為修院地皮及其他有關事項，提供一切便利。他的意思可能是惠賜土地一幅，並且豁免地租，或者只收取極廉宜之租金。

我曾視察過香港郊區的一些土地，位於山腳，地點甚佳，且離市區不遠，海陸交通都很方便。購買這塊十萬平方公呎的土地，若以最優惠的價錢來算，約需美金三千元。

現在，正是買地和著手興建的時候。無論香港會發生甚麼政治或經濟危機，香港仍會受英國管轄，所以是相當安全的，也是接觸各華南代牧區的方便途徑。況且，修院似乎不會牽涉甚麼政治性的問題。<sup>56</sup>

政府願意提供土地，是選址香港的主因之一。此外，在香港教區檔案處存有一封1927年3月11日致予華南各教區首長的信件中提到：

目前中國局面的不穩，致使人們有必要對未來有志於訓導及牧養教眾的人士，提供最佳的培訓條件。按其和平及有條不紊的精神而言，沒有任何地點較香港更為理想了。

政治安定也許是另一原因。但在政治不穩的中國大陸，卻仍有十所總修院相繼落成，可見這並非主要原因。原屬廣州教區的陳子殷神父，在分析當

---

<sup>55</sup> 〈剛恆毅樞機憶述的話〉，尹雅白編：《鐸跡天涯——華南／聖神修院金禧紀念特刊》，（香港：特刊編委會，1981），頁12。

<sup>56</sup>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216。

時的省港教會關係時提到，廣州代牧區是由法國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所牧養，而法國政府一直反對教廷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假如總修院設在內地，只有廣州有條件，但這樣一來則會受制於法國政府，所以若要擺脫法國政府的限制，必須設在其他地區，香港成了最佳的選擇。<sup>57</sup>

### 總修院涉及的教區組成

1927年，總修院的最初決議，是作為廣東及福建兩省培育大修生的地方。但修院於1931年建成之時，收錄了廣東、廣西、福建三省的青年修生。及至1937年，福建總修院成立，華南總修院原有福建籍修生改入福建總修院。<sup>58</sup>

從1931年的情況看，華南三省，共有以下十六個教區、代牧區及監牧區，而其司牧名單如下：

華南總修院所服務的教區及其首表名單

省份	教區	所屬團體	主教名字	國籍
廣東	廣州	巴黎外方傳教會	魏暢茂主教 (Antonie-Pierre-Jean Fourquet)	法國
		中國神職	楊福爵輔理主教 (Bonifacius Yeung)	中國
廣東	汕頭	巴黎外方傳教會	實茂芳主教 (Adulfus Rayssac)	法國
廣東	嘉應	瑪利諾傳教會	福爾德神父 (Franciscus X. Ford)	美國
廣東	江門	瑪利諾傳教會	華理柱主教 (Jacob Edward Walsh)	美國
廣東	韶州	慈幼會	耿其光主教 (Ignatius Kanazei)	意大利

<sup>57</sup> 林瑞琪訪問陳子殷神父，2002-8-28。

<sup>58</sup> 何乃文：〈華南總修院概況〉，收錄於《華南總修院拾週年紀念特刊》，載於《公教報》，1941年12月1日，頁9；卓正賢：〈華南總修院史略〉，收錄於《華南總修院拾週年紀念特刊》，載於《公教報》，1941年12月1日，頁7。

廣東	北海	巴黎外方傳教會	賁德馨主教，一作「賚主教」 (Ludovicus Penicaud)	法國
廣東	澳門		高若瑟主教 (José da Costa Nunes)	葡萄牙
廣東	香港	米蘭外方傳教會	恩理覺主教 (Henricus Valtorta)	意大利
海南	海南	耶穌聖心會	余禮灼神父 (Paul-Marie-Joseph Juliotte)	法國
廣西	南寧	巴黎外方傳教會	沈士杰主教 (Justinus P. Albouy)	法國
廣西	梧州	瑪利諾傳教會	馬神父 (Bernard F. Meyer)	美國
福建	福州	道明會	宋金鈴主教 (Franciscus Aguirre)	西班牙
福建	福寧	道明會	趙炳文主教 (Theodor Labrador)	西班牙
福建	廈門	道明會	馬守仁主教 (Emmanuel Prat)	西班牙
福建	汀州	道明會	歐倍徒神父 (Egbert Pelzer)	德國
福建	台灣	道明會	楊多默神父 (Tomas de la Hoz)	西班牙

\* 按《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台灣於1913年脫離廈門代牧區成為獨立監牧區，但仍屬福建省。另外，地方教會在不同歷史時期在教會體制內的地位都不盡相同，本書為方便表述或以教區統稱，個別教區的詳細歷史劃分演變，請參閱《接替年表》。趙慶源：《中國天主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台南：聞道出版社印行，1980。



## 財務來源和分攤

由於華南總修院是一所地區總修院，是集多個教區的力量而成，並且為它們服務，所以原則上財務開支應由所涉教會轄區分擔，但初創階段，「建築費當逾港幣二十五萬元」，鉅額款項大多數是由教廷傳信部支撥。<sup>59</sup>

不過，各教區仍需負擔日常運作中的一些費用。分擔比例有不同的計算法。第一個分攤方法是按教會轄區分攤，即將費用均分給它們，這種分攤法用於修院的首期建築經費上。剛恆毅總主教在上述致傳信部的信件中即提到這一點。他在原建議中，仍要求有份保送修生來受培育的教區，都應分擔百分之二點五費用。

原則上，各地方教會所負擔的數目應是均等的。但實則還款情況並不清楚，加上自 1937 年開始，內地教會受日本侵華戰爭的傷害，經濟一落千丈，房地產收入驟降，相信大多數教區都無力償還。

第二個分攤方法是按修生人數比例，即按「頭顱」計算。每個教區應負擔其所派遣修生的生活費。然而，由於歸屬問題，生活費由誰負擔，又出現了不同的考慮。

剛恆毅總主教在信件中提到，「至於華南修院的主權問題，依我的意見，該屬於傳信部。」<sup>60</sup>於是傳信部便得為沒有財力的地方教會承擔經費。陳子殷神父亦憶述：「每個教區都由傳信部津貼，以支付修生學費。傳信部按修生的人數撥款。」<sup>61</sup>據陶成章神父所說，上述教區中，梅縣、桂林、江門、梧州四個教區，委托給美國瑪利諾會，由該會派學生來，所以費用由瑪利諾會支付。<sup>62</sup>

魏希信神父也提到，傳信部每年有經費撥給瀋陽教區，由巴黎外方傳教會代管，所以在港的瀋陽教區修生的學費及生活費，也由教區所得的款項中支撥。相反，魏神父在北京進入小修院的階段，學費及生活費反由修生的

<sup>59</sup> 見〈建設中華修院公函〉，收錄於《公教報》，1931年6月1日，總35期：頁2-3。

<sup>60</sup>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216。

<sup>61</sup> 林瑞琪訪問陳子殷神父，2002-8-28。

<sup>62</sup> 林瑞琪訪問陶成章神父，2002-9-6。

家庭負擔。魏神父尚記得，當時的學費是每月一包麵粉，重約三四十公斤，父親送他進修院的時候，買了很多包麵粉作為學費。<sup>63</sup>

1949年以後，由於國內局勢驟變，大陸上不少天主教修院無法維持正常運作，大量修生南遷，華南總修院於是驟然增加了很多修生。除了傳信部應允必予補助「流亡修生之特別經費」<sup>64</sup>而承受財務壓力，各個教區及傳教會的財政壓力亦很大。以汕頭教區為例，當時駐香港的汕頭教區代理李若安神父需要自行籌款，以支付該教區在華南總修院的修生的學費。<sup>65</sup>

## 政治事件的重大影響

對華南總修院影響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有二，一為1941-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略者的軍事佔領。二為1949年中共建政後，大量各地修生由北方轉來，這使得修院的畢業生變得充滿全國色彩，以後者的影響尤為重要。

根據駱顯慈神父 (Fr. Michael McLoughlin, SJ) 的記述，二次大戰爆發前，政府已通知院長，一旦戰爭發生，會徵用修院作為避難所，修生及神父都必須離開。戰事最初幾天，修生或協助安置難民，或指導派發食物，直至日軍佔領香港便結束了這些工作。

1945年5月，是香港淪陷期最艱苦的時候，也是華南總修院最艱苦的時候。黃景賢神父憶述當時的狀況說：「舊日繁盛之區已成為荒城野市。由民政一變而為軍政，原每日每人六兩四配米辦法亦取消，修院至是山窮水盡。」<sup>66</sup>為求生計，修院最終決定接受澳門教區羅若望主教 (Bishop João de Deus Ramalho) 的邀請，遷徙所有修生至澳門修院，直至11月有六位修生突然從內地乘掃雷艇回來，修院遂決定全體修生回港及重開課程。<sup>67</sup>

---

<sup>63</sup> 林瑞琪訪問魏希信神父，2003-3-11。

<sup>64</sup> 〈梵蒂岡教廷訓令 大修院移安全區〉，載於《益世周刊》，1949年2月20日，第31卷第23期。

<sup>65</sup> 林瑞琪訪問姚崇傑神父，2004-7-20。

<sup>66</sup> 黃景賢：〈香港淪陷期間的修院生活〉，載於《香港鴨巴甸華南總修院》（香港：華南總修院，1956），頁95。

<sup>67</sup> 駱顯慈、林瑞琪譯：〈華南總修院歷史考究〉，頁16。

總修院在其後的三年裡，渡過了難得的平靜生活之後，又要再度面對因為中共建政而起的政治波瀾。

大陸政權易手後，接著數年內地修院多被封閉，修生被放逐到各處。據 1949 年 2 月 20 日的《益世周刊》報道，針對 1949 年以後的不穩定局面，教廷傳信部長畢翁砥樞機（Cardinal Pietro Fumasoni Biondi），次長剛恆毅總主教，連教宗比約十二世均一致主張，並且訓令大陸各地的教區首長，將「大修院生遷往安全地帶，繼續學業」。因而出現了大規模的南遷行動，大部分到了香港。所有進華南總修院的申請都獲得批准，雖然連宿舍的問題也難解決，飯堂所有用膳時間都要分兩批進食。神哲學課程都倍增。倫理神學共有三班，而教義神學及哲學都加倍。

### 華南總修院去向的討論

華南總修院的高峰期收納了一百二十名來自中國全國各地的修生，但五十年代中期，隨著原有的大修生畢業晉鐸或離院，六十年代又再沒有修生從大陸其他教區前來香港，修生人數已大幅減少，1963 年時已減至分屬五個教區的十二名神學生及三個教區、一個修會的十五名哲學生。

偌大修院的去向成了令人關心的課題。駱顯慈神父撰寫華南總修院的終結時，有以下的憶述：

所以不難意料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星期一，署理院長科利神父（Fr. Foley, SJ）會接獲傳信部的樞機主教一封函件，表示聖部已決定從學年結束時起「不再維持總修院的活動」。<sup>68</sup>

華南總修院最終在 1964 年中結束，一切物業移交香港教區，轉為聖神修院之用。不過，由香港教區續辦修院，原來並不是原先的構想。早於 1961 年，有關修院的命運已在討論，而教廷及香港教區尚有多項選擇。

當時香港教區白英奇主教於 1961 年 7 月 7 日致傳信部部長雅靜安樞機（Cardinal Grégoire-Pierre XV Agagianian）的信件中，提及傳信部長與主教的代表華德中蒙席（Msgr. Charles H. Vath）的會面。信中白主教寫道<sup>69</sup>：

<sup>68</sup> 駱顯慈著、林瑞琪譯：〈華南總修院歷史考究〉，頁 17。

<sup>69</sup>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華南總修院檔卷」。原文為意大利文。

尊貴的閣下：

華德中蒙席談及了與閣下在烏茲堡的會面，轉達了閣下有意將香港仔華南總修院的院址，作為一所在香港興辦而接受東亞國家學生的社會科學學院。

華德中蒙席曾向閣下表示「難以另覓他地安頓現有的修生」，閣下的回應是「中國籍的修生可以送往羅馬，而華南總修院可改作專上學院之用」。

尊貴的閣下，你的意願將在香港建立一所專上學院，華德中蒙席表達了我們無法決定是否使用華南總修院的院址，因為總修院院址的使用權不在香港教區，而在傳信部及宗座駐華大使。

華南總修院現有修生三十三人，其中二人將於不久之後晉鐸，有五人將從小修院進入總修院，所以今年的九月人數將為三十六人，當中有十五位修士屬香港教區。

尊貴的閣下，有關華南總修院院址的地位問題，實由傳信部及耶穌會愛爾蘭會省決定。懇請傳信部直接與耶穌會神父聯絡。

敬候閣下的垂覆，並頌主內安康。

白英奇主教  
香港教區主教 敬啟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在香港成立社會科學院，是傳信部長欲熱心促成的事；相反，白英奇主教的態度則審慎得多，他考慮到華南總修院的法律地位早已超越他作為教區主教的權限，因此極力敦請聖部在作決定之前，讓管理總修院的耶穌會愛爾蘭會省得悉其事。

## 耶穌會對專上學院的質疑

傳信部長接信後，去函修院院長黃永耀神父詢問他們有關改變用途的意見。黃永耀神父回信表示強烈的反對。<sup>70</sup> 該信件以意大利文撰寫，中譯大意如下：

有關在華南總修院院址上興辦社會科學學院的建議，經過徵詢顧問的意見後，我認為我們現今的地方（指總修院）並不適合作學院之用。修院的空地雖然足以興建新的校舍，但該等土地原先只保留作學生的文娛及運動之用。在這麼細小的地方，實在無法清楚分隔總修院學生與社會科學學院學生。而學院與總修院這麼接近，在晚上上課及在課餘學生的踳躑，均難免損害到修生的生活。<sup>71</sup>

雖然院方不太願意改變修院現狀，但在1961年8月份傳信部致白英奇主教的信，以及差不多同時黃永耀神父致予白英奇主教的信，我們都可以看出一點，華南總修院面臨關閉的消息，似乎已成了一般人經常關注的問題，並且在不久的將來，需要面對不可避免的轉變。

事實上，當時的耶穌會香港區會長梁德根神父（Fr. Herbert Dargan, SJ，早期曾用「潘神父」的名字）在同年8月10日致白英奇主教的信函中，也稍微提到他們的委屈：

侯亦純神父（Fr. Joseph Howaston, SJ）神父知會了我，在今早主教閣下所主持的委員會會議上，華德中蒙席向委員會匯報，說香港仔華南總修院將會騰空作為主教閣下所建議的專上學院之用。

無論是總修院院長抑或我本人均未曾收到任何對上述變動的知會，相反，本人曾獲宗座大使及主教閣下的保證，華南總修院的地位不虞改變，假如主教閣下能就華德中蒙席的聲明作一指引，本人深表感激。<sup>72</sup>

華德中蒙席兩天後立即致信梁德根神父，澄清華南總修院的去留前景。信中提及德國天主教團願意資助成立社會科學院的部分費用，但憂慮有關計劃

<sup>70</sup> 原文日期為1961年7月36日，明顯有誤。

<sup>71</sup>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華南總修院檔卷」。

<sup>72</sup>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華南總修院檔卷」。原文為英文。

徵用修院院址，會影響到仍在院內的修生。德國主教團強調只有在修生得到保證有適當的安排，才會考慮撥款資助成立專上學院的計劃。<sup>73</sup>

也許，即使總修院不結束，教廷傳信部也早已考慮在香港設立專上學院。梁德根神父在 9 月份再致函白英奇主教，談及兩個月之前，徐誠斌神父以白主教名義與他會面，並邀請耶穌會負責建議中的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系。但最終耶穌會以缺乏相關人材而謝絕了這項邀請。

## 停辦成了事實

事件發展至 1962 年，白英奇主教的態度也許有所改變。當年 11 月白主教在羅馬出席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時，經已與傳信部就華南總修院的去留達成初步共識。11 月 18 日，署理教區的華德中蒙席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出席者包括副主教明鑑理神父（Fr. Lido Mencarini, PIME）及日後成為香港教區首任華籍主教的徐誠斌神父，他當時是公教進行社社長。<sup>74</sup>

根據會議記錄，華德中蒙席宣讀了白主教於 11 月 8 日從羅馬寄出的信件：

白英奇主教已接獲雅靜安樞機主教的正式通知，華南總修院在香港仔現址的建築物，將移交香港教區作為建立一所社會科學院之用，當前在院就讀的二十七位修生，部分將轉往台灣攻讀，部分將進入香港教區在薄扶林教區小修院毗鄰所新建立的教區修院。白主教他本人在信中同意雅靜安樞機的建議，亦承諾在今後兩年內，在華南總修院的建築物之上，建立一所社會科學院，先決條件是能夠募集到足夠的資金，而學院的建立能配合香港政府教育署的意願。<sup>75</sup>

從檔卷的資料看來，當時的明鑑理神父及徐誠斌神父對即將出現的社會科學學院，曾經寄予厚望。該次會議的記錄又指明：

在收到白主教的信件後，明鑑理神父與徐誠斌神父一同造訪教育司。會面的結果是，教育司署希望首先成立一所大眾傳播學院，稍後可以擴充為完整的社會科學學院。……所提供的課程應為兩年制，幾年之後再擴充為四年的大學水平。」

---

<sup>73</sup> Vath, 1961, 收錄於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華南總修院檔卷」。

<sup>74</sup>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華南總修院檔卷」。

<sup>75</sup>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華南總修院檔卷」。

不過，不知道出於何故，社會科學院或大眾傳播學院的構思均沒有實現。經濟問題也許是原因之一。當年有份參與決策的明鑑理神父指出，香港教區在六十年代對難民的工作負擔十分沉重；而教友人數大增，又催使教區需要撥出更多的資源興建新堂區及設立新的堂區。這都不容許香港教區將資源投放在昂貴的專上教育方面。<sup>76</sup>

## 香港教區獨力承辦修院

另一方面，華南總修院的結束，在傳信部的決定下已成了不可改變的事實。1964年2月18日，傳信部部長雅靜安樞機致函白英奇主教，提到傳信部的最後決定。信中表明幾項重點：

一·2月6日傳信部與耶穌會總會長接觸，表明華南總修院將於當年的學年完成之後（編按：即七月份）停止運作。

二·閣下（編按：白主教）獲授權開辦一所本地的大修院，以接納香港的青年以及華南總修院原有的修生。

三·聖部並不反對閣下將大修生及小修生同時置在香港仔同一地點，直至修院新翼完成為止。

四·對於不屬於香港教區的修生，為了促進本地神職的發展，除非他們求得一位主教接納他們，否則不能晉鐸。由於香港教區有需要，你們可以收納他們加入香港教區，但必須承諾一旦明天中國大陸重新開放，他們應獲准自由地返回國內。

五·有關社會學中心的問題，傳信部無法承擔任何財政上的負擔。在羅馬的各個聖部亦不會對這項建議作出任何指引。假如將來總修院的院址有騰空的一天，傳信部將考慮其是否可以出售。

對於修生的處理安排，1964年3月25日，代理院長科利神父致函明鑑理神父，提及香港政府教育司顏季諾（K. J. Attwell）的建議，讓一些完成哲學課程的修生，到羅富國、柏立基或葛量洪師範學院上課。<sup>77</sup>在此之前，華南總修院的另一個應變措施是將修生移往台灣，也有計劃將部分修生安排到羅馬進修。不過，最終大部分仍是直接轉到香港教區聖神修院。

<sup>76</sup> 林瑞琪訪問明鑑理神父，2005-3-15。

<sup>77</sup> 科利神父1964年致予香港教區明鑑理神父的信件，收入於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華南總修院檔卷」。

# 物



上：中式設計的華南總修院



下：懸掛在大聖堂內的馬賽克十字架（小圖）







左：天文望遠鏡

下：范達賢神父的考古收藏



## 中式建築

修院的設計者是以中式建築設計聞名的比利時籍本篤會士兼建築師葛斯尼神父（又譯格寧，Fr. Adalbert Gresnigt）。他設計過1925-1929年建成的北京輔仁大學，及1927年河北省宣化縣的主徒會會院。葛斯尼神父起初採用四合院設計，把教會的「至公」性質與殖民主義作出區別。然而，三十年代的經濟萎縮，導致有關設計大為縮減，只完成了主樓（南樓），其餘的正面高樓及兩邊側翼和小聖堂都告吹了。<sup>78</sup>

修院的大聖堂是於1956年才興建，由「同濟學派」的陸謙受設計。為配合主樓，建築設計也採取中式風格，但揉合了現代主義，是本地建築師受過外國教育後對中式建築的回應。聖堂主體採用中式「七開間」橫向形制，但功能上跟隨了西方教堂的直向佈局。<sup>79</sup>

## 課程簡介

在教區檔案處「華南總修院檔卷」中的最早期「課程簡介」，可以看到，華南總修院的入學試要求頗高。

- （一）考生必須通過中文、拉丁文、英文及數學的入學試。試卷由華南總修院的教授設定及批改，考試則分別在各代牧區舉行。
- （二）英文、中文及數學的水準應達高中第二年考試的水平。拉丁文水準則包括全套拉丁文文法，以及翻譯某些教父學文選及著名古典作家的作品，例如：凱撒、西塞祿、利維、維爾高等。
- （三）本院課程包括
  1. 一年先修課程，專注於靈修培育，亦附加小量的中文、拉丁文及英文的功課；
  2. 三年哲學及科學教育（包括物理學及生物學）；
  3. 四年神學教育。<sup>80</sup>

---

<sup>78</sup> 駱顯慈著、林瑞琪譯：〈華南總修院歷史考究〉；林社鈴：〈教會建築本地化：聖神修院的建築與風格〉，載《宗聲》，頁167-183。

<sup>79</sup> 林社鈴：〈教會建築本地化：聖神修院的建築與風格〉，頁167-183。

<sup>80</sup>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華南總修院檔卷」，原文為英文。

雖然「課程簡介」沒有註明必須由代牧區當局推薦，然而，入學試由各代牧區主理，顯然當時並不考慮個別的申請。此外，要求拉丁文是必考科目，即表示投考者必須經過小修院培育，因為對中國人而言，不入天主教小修院者，根本沒有地方可以修習拉丁文。而代牧區有沒有考試，或如何考核，又完全是代牧區的事。黃勇牧神父在完成小修院課程後，於1933年來港進入華南總修院，是由汕頭教區一位資深神父撰寫推薦信，沒有經過考試。<sup>81</sup>

至於先修年（preliminary year）是否存在，也成爭議。據陳子殷神父記憶，他於1950年從西貢小修院進華南總修院時，獲豁免先修班，直入哲學，惟必須參與各科的入學試，但分數不公佈。<sup>82</sup>按這樣的說法，先修班在1950年依然存在。但據湯漢樞機於2005年回顧時指出，他的經驗中並沒有先修班的一年，但的確有三年哲學培育。

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國內的政治境況有所改變，未經正式小修院培育而直接進入華南總修院的例子，經常出現，則先修年取消，不難理解，尤其若修生有難民身分，院方根本不收不可。

## 圖書館

圖書館分教授圖書室及學員圖書室。在修院建院第十年，兩個圖書室的收藏量各有數千，學員圖書室是中西書籍各半，當然以宗教培育為主。<sup>83</sup>

1933年入學的黃勇牧神父指出，在修院中可以讀到上海徐家匯徐宗澤神父編的《聖教雜誌》、《聖經釋義》、《天主教聖教史略》，以及《要理詳解》等書，也有拉丁文的《聖經》，甚至可以讀到《清朝文學概論》。他認為，華南總修院圖書館藏量已算不錯，有全套《圖書集成》，當時他就在華南的圖書館首次讀到梁啟超及胡適等人的作品。<sup>84</sup>

陳子殷神父亦提到，修院訂了《新聞天地》這一類時事雜誌。<sup>85</sup>

<sup>81</sup> 林瑞琪訪問黃勇牧神父，2003-1-3。

<sup>82</sup> 林瑞琪訪問陳子殷神父，2002-8-28。

<sup>83</sup> 何乃文：〈華南總修院概況〉，頁9。

<sup>84</sup> 林瑞琪訪問黃勇牧神父，2001-6-13及2003-1-3。

<sup>85</sup> 林瑞琪訪問陳子殷神父，2002-8-28。

而蔡秀峰主教也提到可能是關鍵的一點：在圖書館曾在日侵時代遭到嚴重破壞。<sup>86</sup> 在湯漢樞機印象中，五十年代華南總修院的圖書館，也只不過是一個小型研究中心的份量。

## 修院規章

第二本關於修院的規章於1931年出版，標題是《香港華南總修院規則》，同樣是拉丁文本，附有中文翻譯，內容更為全面<sup>87</sup>：

- 一、 修院宗旨
- 二、 友愛
- 三、 聽命
- 四、 讀書
- 五、 紀律
- 六、 康樂
- 七、 其他本份

## 天文及氣象儀器

修院的課外活動之中，最著名的有兩項，一是考古，一是天文。一如耶穌會於十九世紀在上海徐家匯成立了一所極具規模的天文台，華南總修院在耶穌會士的領導下，也辦起了甚有建樹的天文學。據廖錫光神父的記載，「華南總修院的位置適處於東經線一一四度十分，和北緯二二度四分之間。」位置適中，十分適宜作天文觀測，古端敏院長開設一所小型天文台，特地在愛爾蘭墨利天文台（Markree Observatory）購置一個赤道儀（Equatorial telescope），一般稱作天文望遠鏡。這台一百年前一度被認為世界最大的赤道儀安置在修院西北角上。物鏡直徑是十三寸，焦距可達二十四英尺。<sup>88</sup>

---

<sup>86</sup> 林瑞琪訪問蔡秀峰主教，2003-3-8。

<sup>87</sup>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93。

<sup>88</sup> 廖錫光：〈華南總修院的氣象測候所與天文台〉，收錄於《華南總修院拾週年紀念特刊》，載於《公教報》，1941年12月1日，頁10。

又因為當時本院的耶穌會士們，對於這氣象學，是有專門研究的，所以他們不惜重資，在歐洲購買各種儀器，以備作觀測氣象的補助。修院的氣象測候所，遂於一九三六年八月成立。<sup>89</sup>

華南總修院氣象測候所裝備有充足的設備，包括：氣壓表（Barometer）、溫度表（Thermometer）、濕度表（Hygrometer）、雨量表（Rain Gauge）、日照計（Sunshine Record）。<sup>90</sup>

日本攻打香港時期，日軍對修院的攻擊雖未造成重大的人命損失，卻使修院失去一項貴重的資產。前述的天文望遠鏡被日軍誤會以為是炮位，向它發了幾炮。到了1946年，蔡秀峰主教入華南總修院攻讀神學時，望遠鏡只餘下一點點基座的遺跡了。<sup>91</sup>

### 考古收藏

修院初年另一為人所注目的活動是考古研究。領導考古研究的是范達賢神父（Fr. D. Finn, SJ）。他的成果於不同期刊發表，周若漁神父描述早期范神父率領修生進行考古活動如下：

他（范神父）最初發掘時，並未雇大批的工人，也沒有購置特殊的發掘工具，他只是約幾位本院修士一二工人荷鏟鋤等前往。修院的假日便是他發掘的佳期，他先後到過青山海濱一帶及赤柱，博寮島是他前往的次數最多，因為那裡古物豐富，距離又不遠，從修院乘帆船到那裡不過一小時。他在本港附近工作，除了一次在大嶼山逗留過幾天外，平常都是朝去晚回的。修院的東麓，也給他發掘過，據說也獲得一些古石器。<sup>92</sup>

范神父在博寮島（今南丫島）所發掘出來的文物，包括陶碟、陶壺、石刀、石斧、銅矛、銅箭鏃等，除了在不同期刊發表其考古發現，他又曾代表香港到世界各地分享成果。<sup>93</sup> 部分文物在戰後仍留存在華南總修院的閣

<sup>89</sup> 廖錫光：〈華南總修院的氣象測候所與天文台〉，頁9。

<sup>90</sup> 廖錫光：〈華南總修院的氣象測候所與天文台〉，頁9-10。

<sup>91</sup> 林瑞琪訪問蔡秀峰主教，2003-3-8。

<sup>92</sup> 周若漁：〈華南總修院與考古家范神父〉，收錄於《華南總修院拾週年紀念特刊》，載於《公教報》，1941年12月1日，頁11。

<sup>93</sup> 梁迭起：〈圖閣藏珍：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圖書館歷史初探〉，載於《二十世紀香港天主教會歷史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天主教研究中心，2021），頁357。

樓上，供修生參觀。《華南總修院銀禧特刊》的第十九頁，亦有展示部分出土文物的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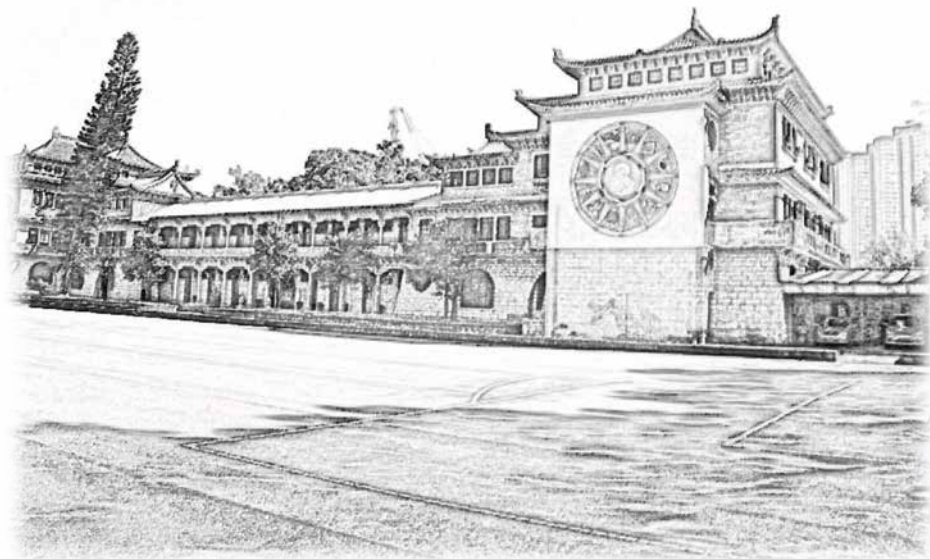
1996年，香港中文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合作在范神父所發掘的基礎上，找出兩座相信是現時所知香港以至華南最古老的房屋基址。<sup>94</sup>令人惋惜的是，范達賢神父在1936年病逝，享年五十歲。自此，華南總修院的考古工作便沒有繼續。

---

<sup>94</sup> 林瑞琪：〈香港教會應為保存歷史作出更多的貢獻〉，載於《公教報》，1996年11月1日：頁2。

## 二十世紀的聖神修院

正如前述，華南總修院已鐵定結束，交接時刻於1964年的暑假進行。在此前的7月8日，白英奇主教致函耶穌會省會長梁德根神父，對耶穌會過往三十年的無私奉獻，表達感激。同月15日，華南總修院代理院長科神父代表因眼疾在海外就醫的黃神父向教區當局致意。7月21日，科利神父與聖神修院院長唐多明神父（Fr. Dominic Bazzo, PIME）在修院飯廳共同簽署文件，將「迄今為止稱為香港鴨巴甸華南總修院的，於未來將稱為聖神修院」的物業管理權移交給香港教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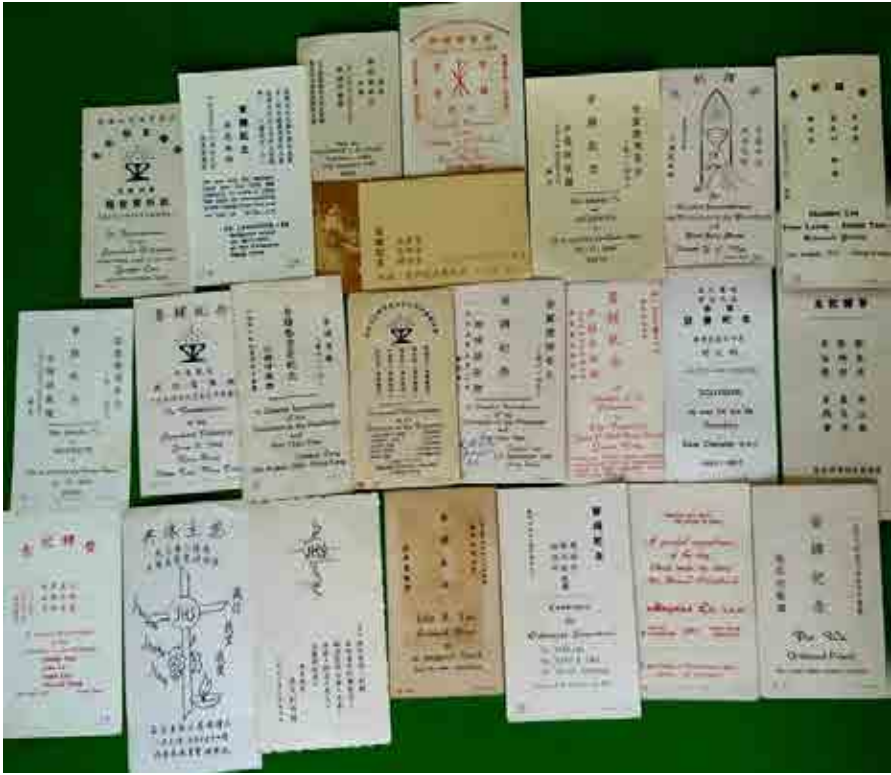


修院既重視修生有健康體魄，也藉運動加強他們的團結合一

聖神修院修生 1965 年在香港大會堂音樂會演出







不同神父的晉鐸紀念卡



聖神修院第一任院長  
唐多明神父  
(Fr. Domenico Bazzo)

## 華南總修院培育出來的院長

香港教區接手華南總修院並更名為聖神修院後，首先由宗座外方傳教會唐多明神父出任院長。在他之後，由馮汝鈞神父成為首位國籍院長起，除了意大利籍的田義神父（Fr. Charles Tei, PIME）擔任過一年代理院長外，在聖神修院出任院長的華南總修院舊生共有六位，按次序為馮汝鈞神父（1967-1968，1969-1971）、李宏基主教（1971-1973）、曾慶文神父（1974-1980）、林焯焯神父（1984-1993）、姚崇傑神父（1993-1999）及湯漢樞機（1999-2009）。除上述六人以外，余福綿神父、關俊棠神父、林祖明神父均曾任院長，但他們都並非華南總修院修讀和畢業，前兩者留學於羅馬，而林神父及現任院長夏志誠輔理主教則在聖神修院攻讀神哲學課程。

## 修生有別於以往

由於華南總修院受內地政治動盪的影響，修生人數激增，一度使之儼如一所全國性的大修院。修生太多，培育者難以顧及個別修生，只有從規律上看修生的表現，而無法看到修生的個性，了解他們。隨著時代及學術的進步，個別修生內心問題的處理方面，毫無疑問在聖神修院是遠較華南總修院時期受到重視。<sup>95</sup>

再者，華南總修院時代，正值走難的階段，生活困難度大，所以修生對一切都懂得珍惜，紀律性強，磨煉出來的堅忍度亦較大。聖神修院時期的修生，沒有經歷這樣的困難，性格上較華南總修院時代的活潑得多。<sup>96</sup>

修生成為神父後，他們的持續進修也不同。華南總修院時期的修生進修，很視乎當時的主教是否支持，以及教區的實際需要。現在聖神修院畢業的神父，有神職人員進修小組跟進，更能清楚每位畢業神父的需要。<sup>97</sup>

此外，聖神修院運作之時，因政局已變，再沒有大陸修生前來就讀。直至九十年代，兩位大陸神父前來短暫進修，如今更成為中國天主教會主教。他們是閩東教區詹思祿主教及廣州教區甘俊邱主教。

---

<sup>95</sup> 林瑞琪訪問姚崇傑神父，2004-7-20。

<sup>96</sup> 林瑞琪訪問湯漢樞機，2003-3-11。

<sup>97</sup> 林瑞琪訪問林焯焯神父，2004-7-14。

## 培育團的轉變

師資和培育團的轉變也是培育出現變化的因由。梵二之前，修院較注重個人神修，視世俗為危險及威脅；從華南總修院走到聖神修院，有一種由一元邁向多元的意味。當年的華南總修院以愛爾蘭耶穌會士為主，雖尚有奧國、加拿大及中國籍的會士，惟學術上仍偏重耶穌會傳統。培育者純是耶穌會士，只有為數極少的中文老師，教師的資歷不夠廣泛。神哲學院成立後，香港教區結合了澳門教區及幾個大修會的力量，使得學院有較高學歷的教師隊伍，不同修會的人材可以支援。<sup>98</sup>

---

<sup>98</sup> 林瑞琪訪問曾慶文神父，2004-7-9。

# 事



兩間教區小修院：  
薄扶林的聖神修院  
（Holy Spirit Seminary 上及中）  
及位於西貢的聖神修院  
（Holy Ghost Seminary，下）





白英奇主教與聖神修院全體神長及大小修生（1965年攝）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在不斷發展下，教友和修女都可以接受神哲學培育

## 與耶穌會關係未了

雖然業權和管理權已移交，耶穌會與香港仔修院的關係並未完全終結。1970年，徐誠斌主教回應梵二大公會議的培育精神，邀請澳門教區、耶穌會及慈幼會合辦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將香港教區和澳門教區的修生，以及修會的修士齊集在一起接受神哲學的培育。多位耶穌會士其後一直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任教，延續他們前輩的奉獻精神。不過，與華南總修院年代不同的是，往日他們純粹是培育者的角色，但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年代，耶穌會亦把他們修會的修生送到學院攻讀。

在課程上，梵二後聖神修院引進中國哲學的課程，中國哲學的精神與教會精神很接近，與教會的士林哲學配合得很好，更實用。<sup>99</sup>

## 在不同地點的聖神修院

除了承接華南總修院的聖神修院，香港天主教會實際上在不同時期有幾間分佈在不同地點的聖神修院。原本在堅道總堂前面的聖母無原罪修院，在華南總修院開辦後，轉為小修院，當時仍有三十六名修生。1941年，小修院因戰爭爆發，被迫關閉，修生被遣散回家。戰後，小修院建築物因有倒塌危險而拆卸。

教區於1948年在西貢建成新修院（崇真天主教學校現址），名為聖神修院（Holy Ghost Seminary），但重開之時只得七名修生。由於地點偏僻，蚊蟲為患，西貢的小修院並非理想的培育地方。1957年，二十八名修生中，就有十多人患上流行性感冒或瘧疾。院方也難聘請到老師，於是在1957年四月的復活節，遷往薄扶林由巴黎外方傳教會捐出的土地上所新建的小修院。

新修院位處當年牛奶公司的草地，後面是露德聖母堂及教友村，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為其納匝肋印書館的工人蓋的房子，稱為太古樓。<sup>100</sup>此時小修院的英文名稱改為 Holy Spirit Seminary，中文名稱仍是聖神修院，修生人數至1963年達六十五人。

---

<sup>99</sup> 林瑞琪訪問林焯煒神父，2004-7-14。

<sup>100</sup> 尹雅白：〈修院搬往薄扶林〉，《我的司鐸聖召路》，見於尹雅白神父網頁，<https://frjameswan.org/my-vocation11>，[2021-5-31]。

1964年7月，華南總修院功成身退，教區將香港仔的這間修院改稱「聖神修院」，但在功能上，它集合了大修院和小修院於一身。薄扶林小修院的修生也搬了進去，原來土地便賣給了發展商。昔日小修生除了中學課程，還需要學習拉丁文、聖經等科目，但梵二之後，全球的神父培育已棄用拉丁文作為教學語言，小修院其實是提供中學課程的中學部之外，還加入靈修訓練。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社會經濟改善和教育政策改變，教區於1969年決定不再招收小修生，逐步停辦小修院。<sup>101</sup>

### 神哲學院的出現及升格<sup>102</sup>

正如在前一章的「香港教區獨成承辦修院」小節裡提到，就華南總修院的結束，教區對修生的應變安排，先後在1964至66年派了七位神哲學的修生、1967六位神哲學的修生，和1968年三位哲學修生送到羅馬傳信大學修讀神哲學。另外又留下五位高年班神學生（林焯煒、江潤坤、李國雄、盧子榮和文耀龍）和哲學生在聖神修院完成學業。徐誠斌主教出任香港教區主教時，為回應梵二精神，要培養當地語系化神學及母語教學，便將神學生送往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神學院進修神學，小修生中學畢業可投考台灣的大學聯招，考上輔仁大學哲學系者，都送往輔大旁邊的聖多瑪斯神哲學院培訓。但因台灣政府不承認神學院的學位，不給予學籍，這批神學生不被視為正式學生，故入境簽證不方便；加上在台灣進修的神學生，在當地語系化的牧民訓練推度上有所不足，徐主教便毅然地將他們召回香港，按教區會議的建議，在香港設立一所培育修生和教友的神哲學院。<sup>103</sup>

1970年，徐誠斌主教為履行梵二的精神，和教區會議的建議，在聖神修院內成立「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區會議文憲強調：「我們香港教區，無論是神父、修士、修女或教友，需要有機會接受更高深的宗教訓練。教會應該給他們機會接受這些訓練，大公會議勸勉教友更深入的去研究教義、神學、哲學和聖經。大公會議屢屢提起教區要設立中心或高深學院以達成此目的。」<sup>104</sup>

<sup>101</sup> 馮勝利：〈香港教區聖召培育概略〉，頁177-181。

<sup>102</sup> 本小節取材自周景勳神父的〈反思梵二後香港教友神學培育的發展〉。

<sup>103</sup> 見《香港教區會議文憲》第五章高級宗教教育，（香港：教區司鐸代表會議出版，1974），頁181。

<sup>104</sup> 《香港教區會議文憲》第五章高級宗教教育，頁180-181。

位處修院新翼的神哲學院，在成立之初，只有哲學和神學兩個學部，由香港教區、澳門教區、耶穌會和慈幼會合辦，至1985年再邀請方濟會加入成為合辦的學院董事。神哲學院成立後，成為修生學術培育的地方，徐誠斌主教有見於此，為提升其學術水平，便毅然向羅馬傳信大學申請，使神哲學院成為傳教區被認可的屬校，可頒發傳信大學在海外的神學學士學位和哲學學士學位。因此，神哲學院在學習上配合傳信大學的要求，學習兩年的哲學課程（包括中國哲學的學科）和四年的神學與牧民職務的培育。

1974年，神哲學院神學部得到教廷天主教教育部批准，成為宗座傳信大學屬校。神學部的畢業生通過傳信大學的神學總考，可獲頒授神學學士學位（Bachelor of Sacred Theology）。1994年神學部又取得傳信大學的同意，開始為期兩年的神學碩士學位（教義神學）課程（Licentiate in Sacred Theology (Dogmatic Theology) Program）。但亦因此，神學部需要從傳信大學附屬學院的地位，提升為該大學的成員學院。神學部的升格申請終於在三年後獲批，成為傳信大學神學院的成員學院。<sup>105</sup>

1976年，神哲學院的哲學部亦獲教廷天主教教育部批准，成為傳信大學屬校。哲學部的畢業生通過傳信大學的哲學總考，可獲頒授哲學學士學位（Bachelor of Philosophy）。<sup>106</sup> 2011年，天主教教育部頒佈文件，訂明天主教大學哲學學士課程增至三年。由於神哲學院哲學部未具條件跟隨指引，課程維持兩年，不頒授學位，只頒授由學院發出的文憑。按文件所述，兩年的哲學課程足以為神學訓練提供所需要的基礎。

雖然，神哲學院已是宗座傳信大學的海外屬校，可頒授學位，但相關學位不獲香港政府認可。故此，教友報讀神哲學院的人數不多。

---

<sup>105</sup> 參閱《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2015-2016 學生手冊》的神學學士學位課程〈學院簡介〉，頁1-2。

<sup>106</sup> 參閱《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2015-2016 學生手冊》的哲學學士學位課程〈學院簡介〉，頁1-2。



## 神哲學普及至平信徒<sup>107</sup>

1973年，教區諮議會決議通過，將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的神哲學課程，開放給教友報讀，但要保留神哲學的課程是為培育修生作原則。

在七十年代中旬，當時的「教友總會」為強化教友的梵二精神、神學知識和歸屬感，舉辦了四次每周三個晚上、每次為期三個月的教友神學班。<sup>108</sup> 其中一期，即1978年4月1-30日（四旬期、聖周、逾越節三日慶典與復活節第一周），更在聖神修院進行一個月的住宿培訓，學習和體驗聖周逾越慶典的禮儀。<sup>109</sup>

鑑於參與教友神學班和聖神修院校外課程<sup>110</sup>的教友對神學的熱衷和渴求，學院於1978年為教友開辦兩年有系統的神學課程：「聖神修院神哲院校外課程」神學文憑課程。

1978-79年度，神哲院校外課程由湯漢神父擔任主任，羅國輝和周景勳兩位修生為助理，負責策劃和執行；兩年的課程以循環方式開辦，共有十七個學科，每年分兩個學期，第一學期為9-12月，第二學期2-5月，每學期共上四科，每周上課四個晚上。<sup>111</sup>

礙於教友學員多需白天工作，他們要求院方改良學期的分配。經行政會議商議後，便由每學年兩個學期改為三個學期，第一學期為9-11月、第二學期12-3月、第三學期4-7月，每個學期共開辦三個學科。

「兩年制的神學校外課程」經過多年運作，同學們依然感到有所不足，師生在閒談中，提出「夜間神學課程」的可能性。1988年，院方向神哲學校董會申請成立「夜間神學課程」，簡稱為「夜神」，同時計劃向傳信大

<sup>107</sup> 本小節取材自周景勳神父的《反思梵二後香港教友神學培育的發展》。

<sup>108</sup> 教友總會自1975年10月開始，續辦教友神學課程，內容強調教友如何服務教會、基督徒基層團體、集體領導制、學習與共融、生活指導等。參閱：《公教報》1977年9月16日。

<sup>109</sup> 當時的教友神學班在徐錦堯神父的帶領下，為教友建立「基督徒基層團體」，簡稱「基基團」，並出版了一本資料手冊供學員學習：《樁——基督徒基層團體參考資料》，（香港：「示」出版社）。

<sup>110</sup> 參閱〈校外課程開設神學，主講「教會本地化」〉，《公教報》，1976年11月21日；及〈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本年續辦神哲學科校外課程〉，《公教報》，1977年8月5日。

<sup>111</sup> 參閱周景勳記錄的「聖神修院神哲院校外課程部夜間課程」，1978年8月；及曾慶文的「聖神修院神哲院校外課程部一九八零年週年報告」，1981年1月25日。

學神學院申請給予認可，頒授神學學位。但由於學生沒有天主教教育部要求的三年完整哲學課程，傳信大學只答應畢業生完成四年課程後，通過傳信大學的總考，便可獲頒「宗教學學士學位」。學院為整個制度成立「宗教學學部」，但「夜神」這簡稱一直沿用至今。由是，四年學位制的「夜間宗教學課程」便取代了「兩年制的神學校外課程」。

鑑於宗教學的學士學位課程在要求上比較嚴緊，每個學科都有成績的評估，考試、或論文、功課，都必須達到學位的水準，這為一些願學習神學而不希望考學位的在職教友，以及一些沒有大學入學資格的教友便沒有機會修讀。2013年，在神哲學院校長蔡惠民神父的推動下，校董會通過成立兩項課程：「神學證書課程」（2016年改稱「神學文憑課程」）和「神學普及課程」。七年來，每年報讀人數平均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

神學文憑課程與神學普及課程同步舉辦。四年制的課程分兩階段，首階段為一年的基礎班，次階段為三年的進階班。普及課程只要求學生出席課堂，不需呈交作業或參與考試評核。學生修畢所有科目，而出席率不少於80%，可獲頒發出席證明書。文憑課程以自學為主，要求學生在每科開課後十二周內呈交該科的作業，經評核合格，便視為完成該科。

2016年院方行政會議，又提出開辦兩年制的「教會職務文憑課程」。從七十年代至今，神哲學院不斷進步和發展，普及神學知識更越來越受平信徒歡迎。



左：  
現時用作神哲學  
院教學樓的修院  
新翼

下：長型的主樓  
兩側是東樓和外  
牆有大型壁畫的  
西樓



聖母山由神長帶領修生合力砌成

物



現代化的圖書館保留古色古香風味



與修院相關的刊物



## 神哲學院大樓

由於小修院的遷入，於是大小修生的人數急增至逾百多人，修院原建築不敷應用，教區便於 1964 年底決定籌建新翼。新廈樓高五層，一樓地下設有禮堂，二、三樓為教室，二樓同時設有小聖堂及會議室，四、五樓為大修生宿舍。新翼於 1966 年底完工啟用，1967 年 2 月 19 日奠基、祝聖和開幕。

這幢後來成為神哲學院教學樓的建築，是由本地建築師錢乃仁及朱彬設計。那是在原來建築物的東翼擴建出來的新樓，以現代主義的功能化為基調，加之中式裝飾元素，融合了傳統和現代的設計手法。五層高的新樓以高層外挑的遊廊，橫長欄杆的設計，隔斷其直立的外觀，巧妙地融合了中國傳統建築橫伸和水平向度的精神，以及中式傳統建築的台基、主體與屋頂三個主要部分，而在現代的功能主義中，則採用了形體跟隨功用（form follows function）和以少見多（less is more）的概念。<sup>112</sup>

## 課程資料

六十年代，政府改變中學學制，聖神修院的小修院也需跟隨學制轉變，由初中及高中改為中一至中五，參加中學會考後繼續預科班。由於政府不承認修院的學位，修院也讓修生投考倫敦大學入學試（GSE），以方便以後的進修。除了核心科目，其提供的課程在六十年代後也開始跟華南總修院年代有少許不同，包括生物及物理的科學教育改為心理學等。<sup>113</sup> 自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於 1970 年成立後，神哲學課程便歸學院安排。

哲學課科目：（1970 年前以下哲學課程科目的講授，純用拉丁文）			
理則學（邏輯學）	宇宙學	心理學	本體學
認識論	自然神學	倫理學	哲學史
中文	社會學	聖樂	
聖教藝術	世界史	倫敦大學入學試課程	

<sup>112</sup> 林社鈴：〈教會建築本地化：聖神修院的建築與風格〉，頁 167-183。

<sup>113</sup> 馮勝利：〈香港教區聖召培育概略〉，頁 182。

神學班課程（1964-68 年以下神學課程科目的講授，除中文科外，以拉丁文為主，輔以英文）				
教義神學	聖經	倫理神學	聖教法典	聖教禮儀
神修學	聖教史	教父學	牧民學	社會學
聖樂	聖教藝術	中文	英語訓練	

## 圖書館藏書

華南總修院停辦後，圖書館亦移交給香港教區聖神修院。當時的藏書均來自太古樓小修院及華南總修院。學生圖書館小得可憐，以中文書為主，兼有少量拉丁文及英文書籍，可能比一個中學圖書館更少。七十年代出任聖神修院院長的曾慶文神父，就有「當時的圖書館設備簡陋，資源不足」之苦。<sup>114</sup> 後來，院方邀請一位美國瑪利諾會神父 Fr. Brown 協助在海外訂購書籍，並收集各地的捐贈圖書，藏量才豐富起來。

其後，圖書館又吸納了公教進行社圖書館藏書，並把服務擴展至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時至九十年代，圖書館進行全面電腦化，以及作出擴展工程，由原來的一層樓增至三層，地下主要存放中文圖書；二樓收藏外文圖書；三樓則存放最新年度的期刊。藏書量已由 1967 年的六千冊，增至近八萬冊，期刊近一百五十種。圖書館並訂購了五個全文電子書的資料庫（Cambridge Companion, Cambridge Books Online, Ebrary, NetLibrary 及 Digital Loeb Classical Library）及一個全文電子雜誌的資料庫，又加入教會資訊網（EIN）。這個基督宗教的合一資訊網提供的聯合目錄，是本港以至全球最大的中文神學圖書目錄，載有約五十六萬八千七百冊的圖書資料。<sup>115</sup>

## 與修院相關的出版著作

關於修院的中文刊物，修院的成員曾出版了幾本紀念特刊，分別是 1967 年的《香港教區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新廈開幕誌慶》、1981 年的《鐸跡天涯——華南 / 聖神修院金禧紀念特刊》、1972 年《聖神修院特刊》、1992 年的

<sup>114</sup> 勞伯堯等編：《神人夢——編織三十又三十：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三十週年特刊》（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2000），頁 4；及林瑞琪訪問曾慶文神父，2004-7-9。

<sup>115</sup> 聖神修院圖書館簡介，見聖神修院網站：<<http://www.hsscol.org.hk/lib.about.html>>，[2021-05-25]。

《華南 / 聖神修院鑽禧紀念特刊》、2000 年的《神人夢——編織三十又三十：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三十週年特刊》、2013 年的《有緣身在此山中——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宗教學部畢業同學會二十週年紀念特刊》，2020 年的《召叫與回應：聖神修院（華南總修院）90 週年暨神哲學院 50 週年》特刊。另有一本同樣是紀念修院 90 周年的出版物《揭開聖神修院的面紗》於 2021 年由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

除此之外，還有在華南總修院時期的《華南總修院》（1964），慶祝銀禧的《香港鴨巴甸華南總修院》（1956），以及附載於 1941 年 12 月 1 日《公教報》的六頁紙《華南總修院拾週年紀念特刊》。但 1941 年的《公教報》，不是垂手可得，而其他特刊也不是尋常教友所容易找到的，甚至香港教區年輕一輩的神父，也未必有機會直接讀到這些早期的紀念特刊。可幸，聖神修院隨同 90 周年特刊的套裝，附上了幾份當年特刊的電子版，方便後人了解修院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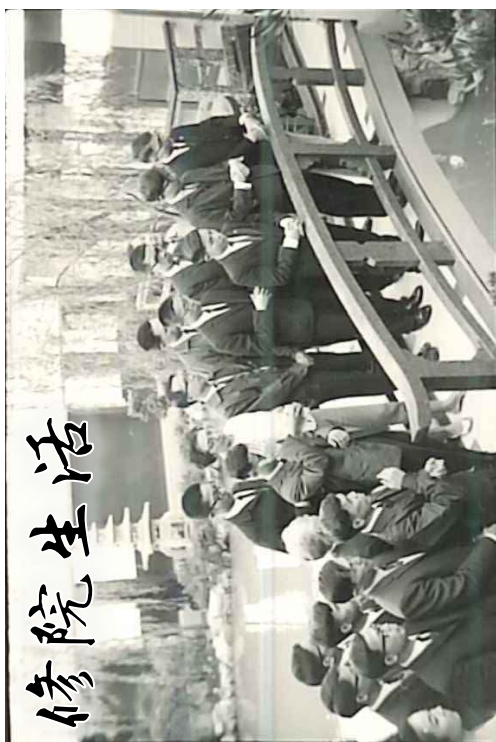
# 圖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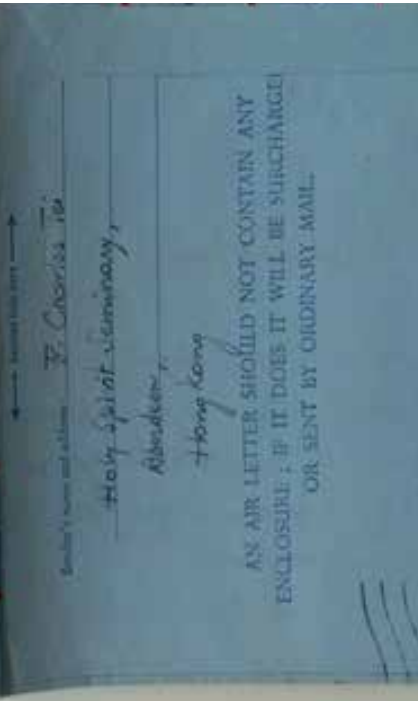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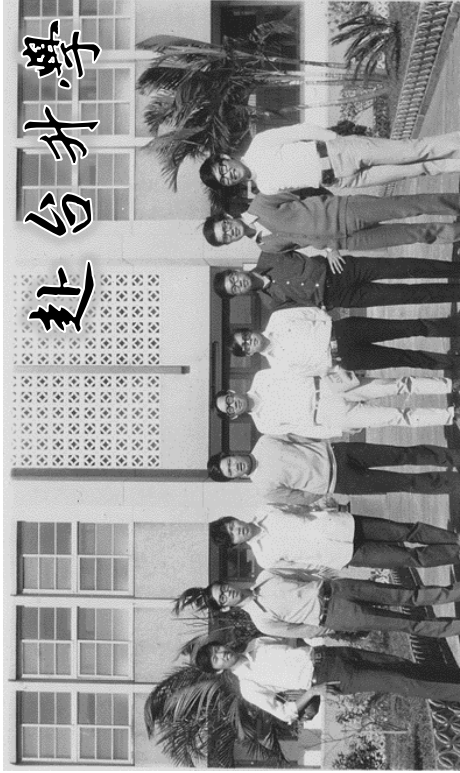
修院生活













到「」藉默會言，中的

### 修院培育

修院生活是培育 and 辨別聖召的時期，修生效法宗徒們一樣追隨基督。聖神修院從人格培養、靈修生活、學術訓練、牧民體驗四方面來培育修生。

### 人格培養

要成為自饋羔羊要有健全的人格。透過團體生活和導師的協助，修生增加對自己的認識；藉著建設以互信、溝通為本的團體，實踐基督的謙遜和犧牲精神，邁向更成全的人格。

### 靈修生活

致力尋找基督，與主共融，使體魄成為生活的高峰和力量的泉源，每日在新贖中接近天主，活在基督的逾越奧蹟內。

### 學術訓練

修生須接受哲學、神學的訓練，俾能對人生、對聖言和教會傳統有更深的了解，並培養獨立的思慮能力，以便帶領教友反省教會和社會所發生的事。

### 牧民體驗

學習善牧基督的愛心，像祂一樣「不是來或服事，而是來服事人」(谷10:45)。透過各種牧民體驗，如照顧長者、服教探訪、關注勞工、聖區工作等，修生可以對教會的服務有更充實的認識和準備。

林志遠神父賀晉鐸七十周年（右下）

廣東門（右上）

修院簡介單張（左）





2011年修院八十周年舊生聚會

鳴謝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第 4, 9, 12, 15, 39, 50 頁圖片

© 天主教香港教區版權特許編號 HKCDA-062/2021，經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准許複印

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文物保育及徵集計劃 (Ricci Hall Archives Conservation & Acquisition Projec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提供第 39 頁范達賢神父考古收藏圖片 (來源: Ricci Hall (1939). Ricci Hall: A Decade 1929-1939. Hong Kong: The Standard Press, Ltd.)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提供第 51, 58 頁圖片

潘惠敏博士提供第 70 頁圖片

以及馮勝利先生和本研究計劃中諸位受訪神父提供的圖片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叢書主編

林榮鈞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譚偉倫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 學術顧問團

夏其龍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譚永亮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勞伯堦教授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古偉瀛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Prof. Philip CHMIELEWSKI, SJ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USA)

Prof. Leo D. LEFEBURE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Peter C. PHAN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Nicolas STANDAERT, SJ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Prof. Gerard Kevin WHELAN, SJ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Rome)

#### General Editors of the Series

Dr. LAM, Anselm Wing Kwa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TAM, Wai Lu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dvisory Committee

Dr. HA, Louis E. Keloa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TAVEIRNE, Patrick, CIC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CHMIELEWSKI, Philip, SJ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USA)

Prof. KU, Weiyo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f. LEFEBURE, Leo D.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LO, William, S.J.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 Philosophy)

Prof. PHAN, Peter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STANDAERT, Nicolas, SJ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Prof. WHELAN, Gerard Kevin, SJ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Rome)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  
華南總修院／聖神修院的人事物

編者： 天主教研究中心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 (852) 3943 4277  
傳真： (852) 3942 0995

網址： [www.cuhk.edu.hk/crs/catholic](http://www.cuhk.edu.hk/crs/catholic)

電郵： [catholic@cuhk.edu.hk](mailto:catholic@cuhk.edu.hk)

承印： 4a Colour Design  
(香港葵涌金龍工業中心第四座六樓 C 室)  
二零二一年八月初版

ISBN： 978-988-79920-6-6

**South China Regional Seminary / Holy Spirit Seminary:  
Remembrance of People and Things**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ditor: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Publisher: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 (852) 3943 4277

Fax: (852) 3942 0995

Website: [www.cuhk.edu.hk/crs/catholic/](http://www.cuhk.edu.hk/crs/catholic/)

Email: [catholic@cuhk.edu.hk](mailto:catholic@cuhk.edu.hk)

Printer: 4a Colour Design  
(Flat C, 6/F, Block 4, Golden Dragon Industrial  
Centre, Kwai Chung, Hong Kong)

First Edition August 2021

ISBN: 978-988-79920-6-6